

#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建议

瑞安集团主席 罗康瑞先生

## 前言

近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新一轮科技革命变革加快，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新冠疫情后全球债务上升，通胀高企，发达国家纷纷紧缩货币，经济前景处于不明朗的动荡期。中国已迈入二十大新时代的发展期，面对复杂多变、极不确定的国际形势，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致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当前发达国家经济放缓，全球贸易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在中美关系紧张、跨国企业“中国+1”战略影响下，2023年春季一些中国企业订单流失，出口增长乏力。有鉴于此，中国需强化内循环体系，激活居民消费潜力，大力提振内需，确保经济平稳发展。中国需要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瓶颈和挑战，本文提出以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五点建议：

## 一、提振内需，发力点在扩大居民消费

中国的消费空间巨大，人口规模比目前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 1.5 倍还要

多。巨大的人口规模将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强劲的发展动能。2021 年中国保持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的地位，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6.83 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4 万亿美元）的 92%。这个消费潜力如能被进一步激发，将十分可观。比如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年收入在 2.2 万美元以上的中国中高收入家庭数量目前略低于欧洲，但在 10 年后可能上升至约 4 亿，这一规模将接近欧洲和美国的总和。

居民消费是中国内需和经济复苏的关键驱动力。按经济发展规律，中国的需求结构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逐渐从投资和出口过渡到消费。消费主导的需求结构更加稳定，不容易大起大落。

中国的消费结构有较大的优化空间，中国的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在 2011~2020 年间平均为 53.3%，与世界银行发布的发达国家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 80% 以及发展中国家占 70% 以上的数据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居民消费占经济比重低，部分源于居民收入较低，目前中国居民收入与经济总量比值仅在 45% 左右，而美国的数字为 83.4%，印度为 76.9%，德国为 60.7%。未来有待通过调节分配手段、多路径推进共同富裕来调节收入增长。

中国居民“不敢消费”，社会保障不足是制约消费的一个主要障碍，我国目前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保的水平有待提高、覆盖面需进一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年来，医疗、教育、社保与就业三大类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从 2015 年的 32.5%，升到 2021 年的 36.8%，上升了 4.3 个百分点，但仍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 60%-70% 的水平。以护士资源为例，WHO 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每千人拥有护士数量为 3.7 人，其中美洲为 8.3 人，欧洲为 7.9 人。我国每千人注册护士数量从 2018 年的 2.9 人增长至 2021 年的 3.5 人，仍未达 2018 年全球平均水平。教育投入以上海为例，

城市教育投入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仅为 4.69%，低于美国的 7.88%，日本的 7.13%，英国的 6.10% 以及韩国的 6.36%。

此外，住房负担能力已成为中国多数大城市的共同挑战，高企的房价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在排名前 30 的城市中，房价收入比为 1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4。在一线城市，这一比率甚至更高，达到了 21。家庭预算中用于住房的份额抑制了其他类型的消费。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启动一系列政策，如土地改革、所有权限制，以及主要城市的贷款限制，着力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加速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提供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鼓励其发展。

除了一些已逐步在推进的改革方向，进一步提升城市化水平也将有助于改善收入、提升消费。如 2021 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46.7%，分别比上年提高 0.83 和 1.3 个百分点，两个城镇化率差距自“十三五”以来首次缩小。随着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能够提高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从而进一步促进消费意愿和消费水平。综合以上因素，促进我国消费市场发展有赖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完善税制、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等方式，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定农民工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 **二、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根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战略目标，到 2030 年中国将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

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目前我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攻坚期。

继 2022 年 10 月美国推出对华半导体管制相关措施后，今年 1 月 27 日，美国与日本、荷兰就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协议。此外，欧盟认为不能让中国获得最先进的芯片技术，必须限制中国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微芯片领域的进展，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已经被“卡脖子”了。目前中国能够制造的只是 14nm 级别（中芯），完全国产化的只有上海中国微电子的 28nm 光刻机，而台积电现在制造的是 3nm。在技术上，中国芯片的制造水平要加快追赶，达到国际前沿的水平。中国核心技术面临西方国家的“卡脖子”科技封锁，突破当前局面的关键是要健全创新体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必须改变在科技发展“追随者”的角色，真正成为引领趋势、占据核心优势的“领跑者”。2021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中国要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打造创新平台。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新时代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和关键节点，是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础上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形成面向全国的多层级科技创新体系，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互补发展和链条创新格局。

基于国家的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分层次布局，建议参照上海创建高水平创新生态系统的经验，选择一批具有科创潜力的城市建立创新生态系统，实现政府、企业和园区无缝衔接和联动，为创新人才和企业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风险投资基金、提供国际水平的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支持、营造包容的创新氛围、打造极具吸引力的办公空间和宜居的生活环境。

### **三、提升专业服务业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迅速崛起，但我们主要是在做低端的加工制造，是“微笑曲线”的中间低端那一段，而附加值较高的产品研发与设计、品牌营销等还发展不足。伴随劳动力和商务成本上升、国外贸易壁垒日渐增多，“中国制造”瓶颈日益严重，往“微笑曲线”两端的转型与升级已势在必行。

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结构性问题明显，当前低效传统服务业比重偏高。市场化服务业（主要包括批发零售、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金融、运输存储、文化娱乐等）与非市场化服务业（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公共行政等）劳动生产率差异显著，前者达到发达国家同时期水平，后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同时期水平。

低效传统服务业使经济陷入高成本、低产出状态。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需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上海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持续巩固，并处于领先水平。202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8%，而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为74.1%，超过世界高收入国家71.8%的平均水平，但距离东京服务业占88%比重仍有一段差距。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应利用专业服务业发达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全球城市功能，加快追赶东京、纽约等全球城市，充分发挥区域引领功能，促进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提升专业服务业发展水平。

### **四、加强法治化制度建设，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过去三年，经济下行使居民和企业的预期产生了扰动，居民、民营企业和外资的信心低迷。有需要加强法制化建设，减少对市场主体的过度监管，优化营商环境，从而稳定市场预期、恢复市场主体的信心。

2021年，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从立法、执法等方面对建设法治政府描绘出发展蓝图。未来法制化将能逐步得到贯彻落实，相信《纲要》能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行政决策制度体系，不断提升行政决策公信力和执行力，为中国顺利实现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法制化社会是吸引和留住国内外投资者的必要保障之一，可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目前尚有不足之处。香港瑞安集团在北京的一个投资项目就遇到了执法难的问题。某公司拖欠瑞安一笔一亿两千万万元款项，该案在2011年就得到法院的判决，负债方需归还贷款本金及支付相关利息，上述债务于2012年已经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名下的核心资产是一处位于北京东二环的办公楼大厦，该物业于2012年已被北京法院查封。但时至今日，法院仍没有启动该资产的评估、拍卖程序，并拒绝用该物业的租金向债权人清偿部分债务，因而该案一直无实质性进展。相信我司遇到的执行难题并非单一事件，其他在国内的投资者或许也存在类似困难。国家在加强法制化建设过程中，需关注法院判决后法制的执行能力，贯彻以法律为依据，高效解决商业纠纷，形成优良的法治制度，增强投资者信心。

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欧美普遍实行的普通法系不同，在推进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地利用香港的普通法体系、发达的专业服务和金融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香港可以继续为中国经济的高水平开放提供桥梁和连接纽带的作用。

## 五、维护、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二十大报告指出，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是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因此应尽量减少直接参与经营和微观层面的干预。中国要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

三年疫情，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营收下降使财务状况恶化，进而导致融资困难，甚至资金链断裂的案例较为普遍。政府需要为私营部门投资和发展创造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环境，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状况，打破国企和国有融资平台的刚性兑付，使金融体系按照资金效率来进行配置。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除了提高国家科研机构的效率外，还需要激发民营企业、科研机构的创新热情，对于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给予财政支持。在当前经济下行周期中，金融体系普遍持谨慎立场，尽量回避对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应鼓励金融机构向有效益的民企提供融资以缓解这一困境，恢复企业家信心。